

老巫與新富： 中國城鄉互動下農村基督教的轉型與地方政府的角色

講者：黃克先
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2012年5月9日



來自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班的黃克先先生，在工作坊演講的主題是中國城鄉基督教的互動，以及其如何促成民間基督教的轉型，同時這也是他博士論文裡的其中一章。講題中的「老巫」象徵的是中國農村基督教，而「新富」則代表1980年代中期興起的城市基督教，兩者在中國城鄉互動頻繁的當下有密切的交流。黃克先企圖藉由觀察這兩個微觀層次的社會群體互動，來檢視當代中國農村基督教的轉型與地方政府的角色。

老巫——中國的農村基督教

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徒人數的擴張速度在世界上數一數二，根據2009年中國官方數據，國境內約有2000萬左右的基督徒，海外基督教團體預估約1億3000萬；美國學術機構的嚴謹問卷調查統計數據約7000萬。1950年代基督教會被共產黨打成反革命團體後，逐漸走入家庭及地下，直到

文革結束，崇拜毛主席的時代過後，靈性真空，基督教適時補進，才又快速在農村散播。這些農村中的中國民間基督教具有強烈地方色彩，挪用許多地方庶民文化，並與農村生活融合，時常可見天啓預言、以及醫病趕鬼的儀式，領導形式通常為長老獨裁。黃克先在田野當中也發現，當地聖歌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地區非常不同，他們稱為「靈歌」，是用當地的地方小調和聖經中的字句編曲而成。此外，農村地區的基督教儀式，也和當地生活相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新富——新興城鎮基督教會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教育擴張、市場經濟出現與中產階級興起，1980年代中期在東南沿海經濟發展地區及各大城市出現了嶄新型態的城市基督教，是深受市場經濟模塑的信仰型態。當時的政治氛圍逐漸開放，基督教的海外聯繫也日益增加，人口大規模遷移及城市化等因素推動了城市基督教的發展。這些新興的城市教會不但財力充足，也有許多大學生加入，使得人力資本也相當龐大，此外在職場、教育領域學習到的組織策略運用，也讓城市基督教的組織管理較為完善。

綜觀當今現況，城鄉基督教之間正進行著持續而密集的互動，且相互影響，互動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包括：宗教信仰者因教育或工作因素的遷移、宗教團體自發的城鄉互動及交流、政府發起的宗教城鄉互動及交流。

第一種類型以農民工到城市裡打工居多，第二、三種則是城市基督教下鄉為主，這些城市基督教徒有一種使命感、責任感及優越感，會自發

性組織宣教團前往農村地區協助農村教會發展，以拯救農村基督教徒的「鄉巴佬」、「幼稚」與「迷信」等現象，即便這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嚴格說起來是非法的，可能會被公安抓）。這些城市基督教工作團為農村教會帶來了許多資源，包括實質上的經濟援助、基督教相關宗教物品、「送靈糧」，¹以及許多和農村教會不同的見識與經驗。農村基督教信徒對於城市教會帶來的東西通常表現出文化好感，這些外來教會的到來滿足了平時住在農村，自稱「沒見過世面的井底之蛙」的農民們能夠與世界接軌的渴望。

老巫的轉型與逆襲

象徵農村傳統基督教的「老巫」，在城鄉互動日漸頻繁的今日，面對來自城鎮基督教的改革壓力，採取了許多正面和負面的反應措施。

從前的農村基督教給人一種「迷信」、「巫術」的感覺，長老能夠替人醫病、趕鬼，然而城鎮基督教進入之後，逐漸帶來「理性」、「正統」的基督教實踐，例如農村基督教的「民間療法」轉變為「無接觸的純禱告」，「打擊魔鬼」轉變為「唱詩禱告排班表」趕鬼，「致意式拜拜」轉變為「與神建立個人關係」。從前的農村教會聚會往往是「靈力展示大會」，現在則轉變為「秩序至上」的聚會。另外，城鎮基督教會也把農村基督教會用地方小調改編的詩歌，轉變為西方古典樂曲形式。

在教會的組織結構上，農村教會也受到城鎮教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例如：從長老掌權逐漸走向功能分化，且更為制度化；從以往的學徒選拔制、終身制，轉變為民主選舉、任期制；從私人掌握奉獻到教會財務透明化；從巫術主雇關係到形成教眾團體。

表面上看起來，農村基督教似乎有個很順利的轉型過程，然而事實上卻有著許多曲折過程。面對城鎮基督教入侵的壓力，有些較為保守的農

村教會長老感受到自己的既有權力，包括制度性（即長老獨裁）及掌握神聖的權力，在教會制度化過程之中逐漸被稀釋，因此做出了反擊，開始與新興權力集團進行鬥爭。有許多例子是掌權的長老重獲群眾支持，趕走外來者及改革派，他們採取的策略有些訴諸既有的地方政府正當性權威，有些訴諸反世俗化的傳統靈性感受，有些則訴諸長老的個人人際網絡及領袖魅力。總之有些長老希望剔除新興的、來自城鎮基督教的勢力，以維護農村教會長老本來的權力。

在這樣的角力過程當中，地方政府的角色相當關鍵，它提供了「老巫」與「新富」雙方一個正當性權威的依賴。地方政府負責的單位是宗教局，老巫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三定原則」（也就是每次聚會都必須要固定地點、固定人數、固定負責人）來反制城鎮教會的介入。此外地方長老由於在農村教會中掌權已久，地方關係網絡掌握度高，舊官僚體系往往能夠成為打擊外來教會的幫手；對於受城鎮基督教影響的改革派而言，必須要以較為正統、清新、拒絕邪教滲透的姿態來回應。反之若遇到較為開明的地方政府，改革派就能夠有比較順利的發展。在偏向實用主義考量下的宗教官僚支持下，往往會協助其推動精神文明建設，提升信仰素質，進行農村改造等措施，使城鎮基督教在農村中的改革得以推動。

周遊式的田野

最後黃先生談到了他豐富的田野經驗，從2010年起到2011年總共進行了七個月的參與觀察，橫跨除了幾個邊緣省份的十七個省市，造訪約150所教會，訪談其中各層級的350名基督徒，包括傳教士、神職人員、一般信徒等，觀察的對象都隸屬於真耶穌教會(True Jesus Church, TJC)的教派傳統。

黃先生每到一個省之後，通常會先以城市教會為對象，先到某一城市的中心教會，進行約兩

¹ 許多來到中國農村的教會成員口條甚佳，他們會為農村教徒講道，稱作「送靈糧」。

週的參與觀察，期間並選取某些人士進行訪談。接著伴隨中心教會的傳教士或長執，巡牧周圍農村教會，或作長途旅行，跟著他們協助其他地區的農村教會，到了農村以後再選取當地農村教會人士進行訪談。藉由這種「伴隨有力人士的周遊」，能夠在有限時間內有更多機會觀察到圈內人的互動，也能夠觀察城市人與農村人、宗教領袖與信徒，跨界的社會群體互動、劃界與認同建構。

在進田野的過程中，黃先生也發現研究者本身也可以是一個觀察互動的對象，因為他來自美國、又是博士學生、身上帶有中產氣息，在與農村教徒的接觸過程當中，可以觀察到他們對於這樣一種身分的人會採取什麼樣的互動方式；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關係如何釐清，永遠是方法論的重要主題。

（整理：蔡睿洋）